

(台湾) 张放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我看大陆当代小说

我看大陆当代小说

(台湾) 张放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样本书

(苏)新登字 007 号

我看大陆当代小说

作 者:(台湾)张 放

责任编辑:朱建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京新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130,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0428-3/I·409

定 价: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者的话

中国新时期文学以其繁荣、宏大的现象,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部《我看新时期小说》应该说是一个注脚。

台湾作家张放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宽泛地阅读了相当数量的新时期小说。他的阅读在情感上是相当投入的,主体意识也强,结果就有了这部著作。

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学术论著。它太多主体情感的释放,耽搁了艺术的判断,是一种即时性的阅读感受的记录。好在它展示了一种视角,为新时期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不同的参照点。这就有了价值。

张放先生对新时期的“乡土小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流露了不加掩饰的偏爱。这大约是一种认同。一种对新时期的“乡土小说”接续了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的脉动的认同。对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揣摩

和礼赞,构成本书的一个主要方面。

本书一部分文字批评了新时期小说的某些现象,诸如反传统、西化、性描写以及“玩文学”等。情绪激越,措词尖锐,显露出强烈的排斥性。

本书作为个体的评价和品味,无疑是有眼光的。但是,海峡两岸之间的长期的隔膜,又极易造致生分,故难免视角视域上的差异。出版者的本意,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仅是提供一种参照而已。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九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章 农村题材小说的丰收	(14)
第二章 军事题材小说的发展	(29)
第三章 通俗武侠小说的畅销	(40)
第四章 新潮小说与伪现代派	(47)
一、反传统的逆流	(47)
二、精神病者的呓语	(54)
三、西化的畸型儿	(62)
四、世纪末的迷茫心态	(69)
第五章 新时期小说作品漫评	(74)
一、杜埃《风雨太平洋》	(74)
二、叶君健《寂静的群山》	(83)
三、延泽民、雪燕《她在凌晨消失》	(88)
四、竹林《呜咽的澜沧江》	(94)
五、水运宪《祸起萧墙》	(99)

六、王润滋《鲁班的子孙》·····	(106)
七、张贤亮《绿化树》·····	(112)
八、刘子成《青纱帐,母亲》·····	(118)
九、张洁《方舟》·····	(122)
十、路遥《人生》·····	(128)
十一、许辉《焚烧的春天》·····	(133)
十二、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	(137)
十三、陆文夫《清高》·····	(146)
十四、林斤澜《邪魔》·····	(151)
十五、李锐《厚土》·····	(159)
十六、李国文《孤独》·····	(167)
十七、乔良《灵旗》·····	(172)
十八、李芳苓《喜丧》·····	(176)
十九、朱春雨《陪乐》·····	(181)
二十、阿成《运气》·····	(185)
二十一、朱晓平《私刑》·····	(190)
二十二、周大新《汉家女》·····	(196)
二十三、谢友鄞《马嘶·秋诉》·····	(204)
二十四、田中禾《鬼节》·····	(209)
二十五、雁宁《牛贩子山道》·····	(214)
二十六、刘震云《塔铺》·····	(218)

二十七、杨咏鸣《甜的铁,腥的铁》...	(222)
后 记	(226)

写 在 前 面

—

中国大陆新时期小说，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它，应该是非常恰当。小说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新时期的小说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貌，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求变、求新已成为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文学特色。当我于八十年代初，看了大陆小说，不禁大惊失色，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新时期的中国大陆小说，将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篇幅地位。

新时期小说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一是改换了过去“千人一面”的工农兵形象。如今写工农兵，他们有思想、情感，有弱点也有优点，有成绩也有缺失，这是小说创作上最大的突破与进步。

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政策，同时也敢于大胆批评。如《陪乐》批评土改时期划阶级成分的不科学；

《钓龟记》批评干部的蜕化变质；《厚土》批评农村干部的老粗蛮横作风等。

三是在处理异性关系上，有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不像过去的小说，遇到男女爱情，皆以蜻蜓点水式应付了事。

最后是从形式和内容上，小说呈现多样化。各种流派的尝试写作，这里有一定的缺点。但在小说创作上而言，它是繁荣的现象。

我常认为中国大陆的小说作品，大多具有浓重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这是从“五四”以来创造的光辉成果。

二

过去四十年来，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文学工作者自然隔膜而疏远。即使偶尔读到一些大陆作品，但是因为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不同，读起来也会感到茫漠不解。总的来说，四十年的民族分裂而产生的隔膜，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一场空前的悲剧。

鲁迅说过：“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整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从八十年代起，台湾各报纸副刊、文学刊物开始发表、介绍大陆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瞩目，同时台湾各大

学文学科系、各文艺社团也展开了对大陆文学的研究与讨论。这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化解民族隔膜促进民族团结具有积极的影响。

近十年来,台湾刊载大陆的小说,以及出版大陆小说作品最为畅销。造成畅销的主要原因,一是小说最能具体的反映出人们现实的生活状况,传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感情;其次是经过长时期的隔绝与分离,住在台湾的外省同胞,对于故乡的一切都怀抱着极其关注的情感,而通过小说才可以真正嗅得到故乡的泥土气息。我是小说作者,当然对于大陆小说作品具有浓厚的喜爱之情。当我看过不少所谓新时期文学小说作品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爱,喜的是自从改革开放后,文学作品有了显著的变化,许多小说具体地纪录了时代的烙印,忠实地表现出炎黄子孙的欢乐与悲哀情感。老实说,“文革”以前的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卫延安》、《香飘四季》、《红旗谱》等,我曾细读过。尽管从字里行间感触出文艺政策的限制,但这些仍不愧是优美真挚的文学作品。契诃夫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个负着责任的人。”若是老把小说家当吹鼓手、唱喜歌的工具,怎会产生伟大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呢?新时期的小说,由于冲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写作上比较开放自由,因而确实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这是十分可喜

的现象。可是由于少部分的小说作家,为了迎合读者胃口、争取市场销路,甚至盲目追求西方的落后形式,斑驳了大陆文坛的色彩。为了帮助文学青年正确地认识新时期小说作品,为了给大陆上的文学评论家、小说家提供具体意见,促使我开始对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兴趣。

首先必须要向读者说明,我来研究和评论大陆八十年代小说,并不是完全正确。一则文学水平低;二则对于海峡对岸的文学发展趋势,毕竟了解不够细致深入,难免发生隔靴搔痒的错误。

这里恕我说出一个事实:据大陆统计,十年以来,大陆刊载台湾文学的杂志有七十多种,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一百五十多位作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新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选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张葆辛也编了四卷本《台湾作家小说选集》;至于大陆十年来出版的台湾小说研究专书,如封祖盛《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等,我都曾先后翻了一遍,恕我说句冒昧的话:尽管这些文学评论家付出了心血劳力,为研究台湾小说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正如同瞎子摸象,根本摸不出象的原始面貌。

我不必列举大陆文学评论家对台湾小说的片面

认识,以及他们根据美国一二位学院派的“现代文学评论家”的作品转引过来的错误评论。试想在文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的好与坏、美与丑,已经混淆不清,真伪难辨;何况海峡两岸还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隔膜,那犹如一团乱丝,若把它整理出有系统有条理的史料,怎是一桩容易的事?

去年冬天,在一次文化座谈会上,我听到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祖慰说:“我从巴黎来台北已经四天了。四天之中,我马不停蹄到处参观访问,如饥似渴想吸收点新的文化;但是我非常失望,我认为台湾没有文化,如果说它有文化的话,那是大金牙文化。……”

祖慰是一个作家,年纪比我年轻十多岁。他的批评是坦率而诚挚的,他是爱之深、责之切,发自内心的话。但是我却按捺不住,站起来驳斥他说:“你来台北四天,看得如此清楚,实在佩服。你比我这个在台北住了四十年的人还有发言权。不过,看任何事物不能只看片面,应当看全面;不要只看现象,应该去探求本质……如果台湾没有一点文化,台湾经济奇迹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难道我们是靠买股票、买彩券发的财吗?……”

我所以要提起这件不甚愉快的往事,便是藉此对于十年来研究台湾文学的大陆评论家提出意见,若正确地评论台湾文学作品,应该客观地研究各种文学作品。你们不能只知道白先勇、陈若曦,甚至於梨华;当

这三个小说家开始摸索习作，陈纪滢、王平陵这二位老作家已经驰名中外了，为什么大陆的“台湾通”却不提陈、王二人，这怎么会让人心服？这种研究台湾文学的成果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但是当前大陆上的文学评论家，大多数还具有公正客观的态度。我认为作家、翻译家毕朔望的一番话，最获我心。他说：

台湾文学介绍还应更全面、更深入，三十年代日据时期的新文学要介绍，五、六十年代的“反共文学”也要介绍。既是文学现象，就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两岸作家都有成功的经验，多借鉴、多交流，有好处。（1）

大陆的小说作品，一般地说，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在语言与词汇的使用上具有民族风味，这是台湾小说所难以相比的最大优点。台湾小说的西化色彩比较重，词汇也明显感到不足，若是解决此一问题，有效地使用方言，比生吞活剥地转引西方词汇更为高明，这是不容辩论的事实。早在半世纪以前，周作人就说过：“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2）新时期的大陆小说，有些新生代作家扬弃了传统的优点，却盲目模仿西方小说的技巧与词汇。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与《信使之函》，残雪的《公牛》和

《苍老的浮云》，他们使用的莫名其妙的文字，荒谬绝伦，简直到了令人喷饭的地步！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史上空前的现象。

现在，我姑且举出两段小说文字，提供参阅：

我对令人艳羡的舞步，素来缺乏记忆。信使的双脚因刻意的行走而被规范至循规蹈矩的一往直前，致使将略加变化的迂回摸进视作内心图案的晦涩的翻版。

孙甘露：《信使之函》

当海洋微微蠕动起来时，我把背部露出水面，灼热的强光扩张着我的心脏。我翻过身来，寻找那面镜子，在疾速的一瞥中发现自己的眼睛变成了两朵紫罗兰。白鲸的沉思是永恒不破的，破冰在远方撞击……
残雪：《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

在写实主义的领域内，没有生活即没有创作，这是通过检验而获得的文学理论。左拉说过：“有些小说家甚至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却仍然是个外省人。他们对自己乡土的描绘方面是出色的，但一接触到巴黎的场景，便寸步难行了。”一个小说家应当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若是盲目追求新形式，写出莫名其妙的东西，作者的创作动机读者大概也会明白：他们是为了投机取巧、走捷径、骗稿费，蒙蔽广大的青年读者。十年风水轮流转，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界的歪风，如今已吹向了中国大陆，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1)引自彭韶倩:《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2)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

三

七十年代初,我住在新店溪畔一座鸽笼小楼。看到浩然的《艳阳天》。“文革”时期,浩然红得发紫,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便是除了鲁迅著作,就是浩然描写的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艳阳天》。这两部书我都曾通读一遍,小说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还是很严谨的。只是政治意味稍浓些。

那晚,窗外飘着凄冷的雨丝,内心惆怅至极,我打开《艳阳天》,看到代表“两个阶级”的农民,正在抬杠,充满了火药味。

“咱们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谁!”

“栗子花生一盘端,一个长在树上,一个生在地里,咱们就从来没有连着根儿!”

也许当时我的情感比较脆弱,也许我有些敏感,这些话竟然逼得我热泪盈眶。那时我和海峡彼岸的兄弟尚未联络。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语言,使我感到非常失望!纵然我们有些政治观点不同,但

是对于拥有数亿农民同胞，我们同样巴望他们早日摘下一穷二白的帽子，受不到自然灾害苦难。当五谷丰收的季节，每个农民都捧着盛满鱼肉的饭碗……

若想使中国农民摆脱穷困的面貌，首先便是节育问题。六十年代初，马寅初曾提出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当时在人多好办事的最高指示下，否决了马寅初的远见，这是一项最大的错误。人口的继续膨胀，造成中国农村的一穷二白，永远无法翻身。

有一篇张石山写的短篇小说《村宴》，描写太行山区青石沟的农民张三货，因为儿女众多，生活艰难，公社化时期便已沦为“贼人”，实在让人心酸难过。

贼人锅三，大名张三货。……三货原先并不偷，只伏倒身子下死力，将一口背锅愈养愈大。不料他娶得一个老婆是只母猪，八九年间就给他下出十来个崽子来。……十来个孩子，肚里怀着一个，怀里奶子上吊着一个，背上还挂了一个。屁股后面蛤蟆卵似的挤了一堆……

张三货所以沦为“贼人”，主要地还是孩子多。人口众多造成了贫穷与落后。目前中国大陆国民收入平均只有三百美元左右，属于世界穷国之列，究其原因，人口实在太膨胀了！

正是一九六〇年，人人挨饿，大家素日看不上眼的贼人锅三活活树起来一个榜样。要一张浮肿了的面皮，倒不如做一名饱贼。民兵看场偷场，干部管库